

访问杜南吾先生的记录

(附5—136—2—5—3批的访问记录)

1057

44

訪問杜省吾同志的記錄

1960.3.30 于 郵 電 部
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河南入党，旋即去北京，同年四月出关来到东北长春（当时的宽城子）。长春有第二师范、第二中学，我在二中作数学教员（杜省吾同志系北京高等师范数理科畢業，前此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长春只有几名同志，無組織名額，多半是些学生。“杜繼曾”这个名字是我念書和从事教育工作时用的，以后在党内改用“何联生”三字。

一九二六年八月，由长春去哈尔滨，在哈專做党的工作。当时东北党的組織以哈尔滨为中心，称为哈尔滨地方特委。它是在苏联党直接帮助下建立与發展起来的。苏联党一九二五、二六年在中东路工人中間开展工作，其間从苏联學習归国的一些中国共产党员便在哈市落脚，逐漸發展形成了組織，当时的特委書記是吳丽石（江苏海州人，北京俄文法政学校畢業，入党后去苏东方大学學習，一九二五年归中东路，以铁路工人为掩护，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發展一些工人入党）我去哈后即在特委作秘書工作，当时的名称是“技术書記”，負責抄写、起草、轉發接送文件等工作。哈尔滨有党办的报纸，苏联党撥出一些款項帮助办报，我曾在报館工作一个时期。

中东路的工作發展很快，我听吳丽石講过：一九二五年底，中东路沿綫仅有几名同志，而至一九二六年同期从分發文件的数字中統計，已增至五十几个同志了。有青年团組織，英文縮写成CY。中东路的工会可以公开活动，党在后面加以領導和指揮。稍后，中东路沿綫的滿洲里、牙克石、博克圖，扎蘭屯、安达、阿城、牡丹江、磨刀石到綏芬河全有党組織或黨員。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到吉林，那一年正是日寇开修吉敦路，吉林龙潭山桥刚刚建成。吉林当时有五、六名党员，除了一位姓佟的在吉林模范监狱外，其余几位全是学生，其中有个张玉珍是该地最早的党员。毓文中学有些同学同情党，如关森、沙莹等人，以后都变成了文化人。我到吉林，按照党的指示成立吉林县支部，前此吉林无党的组织。我们有一名同志在乡村做农民工作，但无甚收效。我在城内做学生工作，党内每星期在我家开一次生活会，看些党内文件。同时哈市有几位同志被捕，解往吉林模范监狱看押，我们通过佟某接济在狱内的同志。

在我去吉林工作的同时，韩守本、赵尚志由哈去长春工作，韩守本是长春最早的党员。他们到长春后不久即被捕入狱。原因是，国民党从广州派一些原来东北人士回来建立组织，在吉林要成立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当时由于国共合作，韩等公开面目也是国民党党员，但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印信不肯交给韩等，而据在董海平之手（董为国民党党员，曾去广州），韩守本一气之下自己到刻字店刻了一个与董手中相同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印信，那是一家日本人经营的刻字店，一面为之刻印，一面向日本帝国主义特务机关和军閥政府告密，将韩等逮捕，日寇並藉此事件在报纸上大肆宣扬，^也惑人心。

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閥统治的白色恐怖环境中，那些国民党人从来不敢活动，韩守本等共产党人则积极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

吉林师范有几个学生，在国民党的催促之下也准备组织吉林县党部。

一九二七年夏天党派陈宜仁来吉林，当时吉林已有七、八个同志，吉长地委可能是陈宜仁在时搞的，我不甚清楚。肖丹峰，我记得他是吉林一师的学生，是一九二七年夏天我在吉林介绍入党的。

我从吉林到牡丹江，两个月后又去哈市，又过一月去大连。时为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节前后。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节，在苏联党的帮助下，由苏、中两党拨款，组织了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会议是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央派了陈洪涛（湖南人）来任书记，吴丽石为第二书记。成立不久，于十月革命节后即迁往奉天。我没跟去奉天，直接从哈尔滨去大连，任关东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在旅顺被捕，邓和高同志已先我入狱。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出狱，日本人将我送到天津，到天津后我转道回河南。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去东北哈尔滨，在东北期间，四六年三月曾去哈东一面坡等处工作。一九四九年入江西，即改做水利工作迄今。

关于党的路线问题：武汉政府右倾以前，党提出拥护国民革命、拥护国民党，拥护北伐，打倒北洋军阀，在东北即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张作霖。当时党的刊物由广州运往大连，再从大连密运至哈尔滨。武汉政府右倾，蒋汪叛变革命，我党领导“八一”暴动以后，党的政策变了，讨论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在此以前尚认为对国民党作的工作不足，迁就尚少。八一暴动后党提出土地革命口号，在哈尔滨的一些同志对此还不明确。满洲省委成立时会订出一个“满洲政治纲领二十条”，与现在的中共纲领差不多，出不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我们在大连关东县委时也制订了一个纲领，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资本，没收日本资本家的财产等等。

当时，党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小。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左”倾路线要求党在社会上大造声势，让人们都知道党还存在着。组织冒险行动，如哈尔滨特委会向苏联党借手枪准备枪击白俄特务机关“探防局”

• 4 •
門衛，苏联党不同意就没这样做。

（杜省吾同志現任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所付所表）

（李長涌、顧民、陈鉄健訪問，陈鉄健整理）

关于胶东区党委开展东北抗日同盟救国会活动情况

一访于谷鹰同志

参加访问人：王致诚、许庆昌、张汉卿。

访问时间：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访问地点：大连市解放路干部疗养院附近于宅。

访问整理：张汉卿

于谷鹰同志，现年七十二岁已离休。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五年曾在中共胶东区党委海外工作部、统战部工作。

于谷鹰同志介绍说：中共胶东区党委对东北工作，就有三个头，是多头进行工作的。有社会部、城工部、海外工作部等。这三个部没联系，多头进行。我在海外工作部系统任科长，另两个部系统的工作情况不知道。一九四四年秋后，三个部合并了，统称统战部。由原社会部长于克同志领导了。

海外工作部对东北工作，不是派遣人而是吸收人。1942年初开始，胶东区党委借东北人回山东老家春节探亲的机会，在二十几个县普遍开展组织海外抗日同盟救国会的活动。从村、县到地区各级党委都召集从东北回家乡的人开会，进行爱国抗日教育，并层层选拔积极分子，报送上级组织。选拔好的发展为抗日同盟救国会会员。一次有个半月的时间，搞了几年，从1942、43、44到45年，南起大连，北到黑河，发展了有三万多人的抗日同盟会会员。这种作法，一般的都起了扩大我们党在东北人民中的政治影响作用，他们回东北虽然不能公开的

大肆宣传活动。但是，走亲串友，咬耳根，秘密宣传活动是普遍的。有的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张士兰烈士就曾在苏军进占旅大时，搞起过一个连的人民武装。张秀山、宋天鹏、于洪海、姜桂芳（女，现大连市妇联主任）等人。他们在八一五前都参加了地下党。大连市这儿抗日同盟会会员几十人，党员七、八个。解放后多数到公安局工作了。

沈阳农学院的张健（？）、罗恒同志是1944年春由胶东派来大连至安东检查组织情况的。临来前，先回家一段，“灰色”一下。然后派来的。

关于东工委的几个问题

一访沈涛同志

参加访问人：张一波、张汉卿

访问时间：一九八二年六月七日

访问地点：大连市建委沈涛同志办公室

访问整理：张汉卿

一、关于“东干队”和晋察冀“东工委”

二、关于派遣训练和对敌工作分工问题

三、关于挺进东北的问题

(一)关于“东干队”和晋察冀“东工委”

关于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延安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延安时，我原是在张学思领导下的“东干队”工作。“东干队”在1940年开到冀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精兵简政，我被调到晋察冀“东工委”。和我一同调来的有曹公和（现潮南军区付政委）、裴生（已死）、罗文（北京后勤部运输部长）、马非文（已死）、刘云鹤（中央建工部外事工作）等一批人，都是“东干队”的。

当时，东工委和晋察冀分局所在地是阜平县，我们到平山县“东工委”负责人韩光同志处报到。住了一些天兵分两路，一路回冀东了，我和曹公和、裴生三个人留下了。他们到冀东去干什么不知道。当时有个问题是，对到底怎么样夺取抗战胜利是不很清楚的。“七大”设想的是城市秘密工作和农村武装斗争相互配合取胜。东北怎么解放？没想到

苏联红军出兵一举消灭了关东军，形势急骤好转这才决定向东北进攻。有人写的好象早就明白了，不是那回事。

那时延安有三个“东干队”，一个是张如九成立的“东干队”，他是东北军的旧人士，有抗日要求，从延安到晋察冀，后来情况一艰苦就不行了，他们的情况韩光同志知道。1939年前后，抗联的李延录到延安后，又成立一个“东干队”，张松（李范五）是秘书长。他们没出发，我们又成立了一个“东干队”，张学思是队长。因为，早在武汉失守前，周恩来同志对张学思有指示，这个“东干队”大约在1939年初组成。1940年9月出发上冀东，路上过的中秋节，后到吕正操三纵队司令部待命。一部分人被分到分区司令部，一部分在政治部见习。全队大约百十来人，绝大部分是东北人。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三纵队到晋西北去了。我们在整编中到韩光处来留下的我们三个人叫我们穿便衣，潜入东北。

（二）关于派遣训练和对敌工作分工问题

在派遣前，开了1—2个月秘密训练班。听讲课时极端保密，各屋门上都挂上门帘，互相看不见，不让相互认识。开始讲课的王永田等人没经验，净从满洲年鉴上摘的敌伪保甲制度统治如何凶残的材料小孩都不会中国话了等，忽视了对东北存在尖锐的中日民族矛盾的讲解，给我们的印象来东北很难站住脚。韩光同志找我们座谈，课讲的怎么样？我们说到那非被逮捕不可，听课夜里做梦就被捕。韩光发现了讲课有问题，后来改正了。受完训就叫出发。裴生先走，其父走

唐山车站长，好出关。（表后来在1946年于永吉撤退时淹死了。）

第二个是我走。要先到天津落脚，头天晚上把天津接头人找来了让我认识认识。叫我到天津找他，并规定了联络信号。第二天，突然变了，告诉我和曹公和暂不派出了，让我们先到冀东调一批干部。这批人后来有三四个找我接关系，其中有杨超时（石青山）

1944年，刘仁同志又把我和曹公和调到城工部工作。

在“东工委”工作的人。我记得有：马秀山管机关工作（现在大连水利局）。吕建东搞宣传（现在西安，陕西省委文教部长）。杨超时管派遣。高英搞交通（现在大连法院院长）

抗战时期敌工工作分工情况。敌工部搞反正，瓦解敌人工作，城工部搞派遣和地下建党。社会部属于公安系统，军队战略侦察（即二处）搞军事情报归滕代远管，情报部，邹大鹏负责搞情报。

三关于挺进东北问题

1945年“八一五”时我正在晋察冀党校正风。8月10日晚上。分局来人通知说日本投降了，大家感到非常突然。欢跳了一夜。连锄拍房草都当做火把点着游行很快搞了几天鉴定党校就结束了我又被分配到“东工委”韩光处报到了。八月十七日，我们向东北出发。全队90来人。杨超时带队。我也是队长。开始准备从阜平到北平上火车。走了七八天。听到北平日军不让进。我们又转向张家口进发。到张家口住了约半个月，后经密云到承德，已是九月下旬了。我们一直是走，从承德才分两批上火车，我们头一批40多人。于十月十三日到沈阳。这时，曾克林部队已开始从沈阳撤退。留一个营叫东北自卫军保护东北局。经军警

联合警察处电话联系后，我们被安排在博物馆东北局招待所，因外边秩序很乱谁也不准外出。十月十四日韩光找我要我和张志远一起到大连来，因为赶着要坐两架回大连的小飞机，韩光没让我回招待所取东西，临时派人找来一套满铁工作服叫我换上了。他告诉我们到大连的任务有三：①叫我们收拢各地来大连的同志，②和工会联系，找唐宏经，③叫我和张志远找陈云涛，他是新金皮口人，办过大连青年会，东北局决定让陈任大连付市长。飞机到大连已经天晚了，按韩光的吩咐打电话找沙河口苏军卫戍区董司令，电话没挂通，到机场附近一个种芽的农民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找到了董司令，董司令让朱秀春把我们送到“大众书店”。“大众书店”挂着牌子，还挂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牌子。他们是大连市一帮革命青年自发搞起来的革命组织，“八一五”后与唐宏经、张洛书、朱秀春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大连的革命势力。在大连开创了我們接收的有利条件。我记得的人有：白全武、车长宽、吴斌、方木、刘汉、于明、林松等人。

当时大连在苏军中工作的除抗联的董司令外，还有抗日联军的季西林是西岗区司令部付司令。李必信（后来在中宣部当过顾问）是苏军司令部政工科长，也是一个区的苏军付司令。刘亚楼（当时叫王松）也在苏军司令部工作。李必信和刘亚楼我们是经常接触的。

人名索引

谢王萍：张学思的爱人（见《辽宁共产党员》1982年第5期）

杨超时：现在中央兵器部

吕建东：陕西省文教部长

高英：大连法院长（“东工委”交通）

王若石：大连警备区付参谋长（知东干队）

金浪：黑龙江省统战部（知延安东北通讯处情况）

史立德：现中央合作总社（原晋察冀敌工部长）

关于东工委的几个问题

一访沈涛同志

参加访问人：张一波、张汉卿

访问时间：一九八二年六月七日

访问地点：大连市建委沈涛同志办公室

访问整理：张汉卿

一、关于“东干队”和晋察冀“东工委”

二、关于派遣训练和对敌工作分工问题

三、关于挺进东北的问题

(一)关于“东干队”和晋察冀“东工委”

关于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延安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延安时，我原是在张学思领导下的“东干队”工作。“东干队”在1940年开到冀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精兵简政，我被调到晋察冀“东工委”。和我一同调来的有曹公和（现湖南军区付政委）、裴生（已死）、罗文（北京后勤部运输部长）、马非文（已死）、刘云鹤（中央建工部外事工作）等一批人，都是“东干队”的。

当时，东工委和晋察冀分局所在地是阜平县，我们到平山县“东工委”负责人韩光同志处报到。住了一些天兵分两路。一路回冀东了，我和曹公和、裴生三个人留下了。他们到冀东去干什么不知道。当时有个问题是，对到底怎么样夺取抗战胜利是不很清楚的。“七大”设想的是城市秘密工作和农村武装斗争相互配合取胜。东北怎么解放？没想到

苏联红军出兵一举消灭了关东军，形势急骤好转这才决定向东北进攻。有人写的好象早就明白了，不是那回事。

那时延安有三个“东干队”，一个是张如九成立的“东干队”，他是东北军的旧人士，有抗日要求，从延安到晋察冀，后来情况一艰苦就不行了，他们的情况韩光同志知道。1939年前后，抗联的李延录到延安后，又成立一个“东干队”，张松（李范五）是秘书长。他们没出发，我们又成立了一个“东干队”，张学思是队长。因为，早在武汉失守前，周恩来同志对张学思有指示，这个“东干队”大约在1939年初组成。1940年9月出发上冀东，路上过的中秋节，后到吕正操三纵队司令部待命。一部分人被分到分区司令部，一部分在政治部见习。全队大约百十来人，绝大部分是东北人。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三纵队到晋西北去了。我们在整编中到韩光处来留下的我们三个人叫我们穿便衣，潜入东北。

（二）关于派遣训练和对敌工作分工问题

在派遣前，开了1—2个月秘密训练班。听讲课时极端保密，各屋门上都挂上门帘，互相看不见，不让相互认识。开始讲课的王永田等人没经验，净从满洲年鉴上摘的敌伪保甲制度统治如何凶残的材料小孩都不会中国话了等，忽视了对东北存在尖锐的中日民族矛盾的讲解，给我们的印象来东北很难站住脚。韩光同志找我们座谈，课讲的怎么样？我们说到那非被逮捕不可，听课后夜里做梦就被捕。韩光发现了讲课有问题，后来改正了。受完训就叫出发。我生先走，其父是

唐山车站长，好出关。（裴后来在1946年于永吉撤退时淹死了。）

第二个是我走，要先到天津落脚，头天晚上把天津接头人找来了让我认识认识。叫我到天津找他，并规定了联络信号。第二天，突然变了，告诉我和曹公和暂不派出了，让我们先到冀东调一批干部。这批人后来有三四个找我接关系。其中有杨超时（石青山）

1944年，刘仁同志又把我和曹公和调到城工部工作。

在“东工委”工作的人，我记得有：马秀山管机关工作（现在大连水利局）。吕建东搞宣传（现在西安，陕西省委文教部长）。杨超时管派遣。高英搞交通（现在大连法院院长）

抗战时期敌工工作分工情况：敌工部搞反正，瓦解敌人工作，城工部搞派遣和地下建党。社会部属于公安系统，军队战略侦察（即二处）搞军事情报归滕代远管，情报部，邹大鹏负责搞情报。

关于挺进东北问题

1945年“八一五”时我正在晋察冀党校正风。8月10日晚上，分局来人通知说日本投降了，大家感到非常突然，欢跳了一夜，连堤拍房草都当做火把点着游行。很快搞了几天鉴定党校就结束了。我又被分配到“东工委”韩光处报到了。八月十七日，我们向东北出发。全队90来人，杨超时带队，我也是队长。开始准备从阜平到北平上火车。走了七八天，听到北平日军不让进，我们又转向张家口进发。到张家口住了约半个月，后经密云到承德，已是九月下旬了。我们一直是走，从承德才分两批上火车，我们头一批40多人，于十月十三日到沈阳。这时，曾克林部队已开始从沈阳撤退，留一个营叫东北自卫军保护东北局。经军警

联合警察处电话联系后，我们被安排在博物馆东北局招待所。因外边秩序很乱谁也不准外出。十月十四日韩光找我要我和张志远一起到大连来。因为赶着要坐两架回大连的小飞机。韩光没让我回招待所取东西，临时派人找来一套满铁工作服叫我换上了。他告诉我们到大连的任务有三：①叫我们收拢各地来大连的同志，②和工会联系，找唐宏经，③叫我和张志远找陈云涛，他是新金皮口人，办过大连青年会。东北局决定让陈任大连付市长。飞机到大连已经天晚了，按韩光的吩咐打电话找沙河口苏军卫戍区董司令，电话没挂通，到机场附近一个种芽的农民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找到了董司令，董司令让朱秀春把我们送到“大众书店”。“大众书店”挂着牌子，还挂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牌子。他们是大连市一帮革命青年自发搞起来的革命组织。“八一五”后与唐宏经、张洛书、朱秀春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大连的革命势力。在大连开创了我們接收的有利条件。我记得的人有：白全武、车长宽、吴斌、方木、刘汉、于明、林松等人。

当时大连在苏军中工作的除抗联的董司令外，还有抗日联军的季节西林是西岗区司令部付司令。李必信（后来在中宣部当过顾问）是苏军司令部政工科长，也是一个区的苏军付司令。刘亚楼（当时叫王松）也在苏军司令部工作。李必信和刘亚楼我们是经常接触的。

人名索引

谢王萍：张学思的爱人（见《辽宁共产党员》1982年第5期）

杨超时：现在中央兵器部

吕建东：陕西省文教部长

高英：大连法院院长（“东工委”交通）

王若石：大连警备区付参谋长（知东干队）

金浪：黑龙江省统战部（知延安东北通讯处情况）

史立德：现中央合作总社（原晋察冀敌工部长）